



Gaolangqiao Jishi
Jindai Shanghai Yige Mianfangzhi
Gongyequ De Xingqi Yu Zhongjie

高郎桥纪事

近代上海一个棉纺织工业区的兴起与终结
(1700 ~ 2000)

罗苏文 著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Gaolangqiao Jishi
Jindai Shanghai Yige Mianfangzhi
Gongyequ De Xingqi Yu Zhongjie

高郎桥纪事

近代上海一个棉纺织工业区的兴起与终结
(1700 ~ 2000)

罗苏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郎桥纪事:近代上海一个棉纺织工业区的兴起与
终结:1700~2000/罗苏文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1

ISBN 978-7-208-10392-4

I. ①高… II. ①罗… III. ①棉纺织-工业区-史料-
上海市-1700~2000 IV. ①F426.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0435号

责任编辑 曹培雷 张晓玲

封面设计 夏芳

高郎桥纪事

——近代上海一个棉纺织工业区的兴起与终结(1700~2000)

罗苏文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9.5 插页 4 字数 683,000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0392-4/K·1837

定价 68.00元

导 言

高郎桥地区位于今上海市区浦西东北端，黄浦江支流杨树浦港与长阳路交汇地带，清初期它是上海县高昌乡一个多姓氏聚落散处的僻乡、准乡镇，民初渐成为上海租界的一个棉纺织工业社区，进入社会变迁的第一次突变期。

晚明黄浦江下游的改道，使该地区从原来的吴淞江出海河道，变成黄浦江下游西岸河浜纵横的漫滩，大片未开垦的沿江滩地吸引浦东、崇明等邻近地区的乡民在河湾浜边落户，以主河道杨树浦港（黄浦江的支流）两侧相对集中。在清康乾时期，高郎庙（1662～1722年）、高郎桥（跨杨树浦港，1796～1821年）的出现，赋予该地区最初的标识性建筑与地名。在引翔港入黄浦江口被堵塞后，高郎桥就成为高昌乡的水路孔道，东接引翔港市，北通宝山县、西入虹口。悠悠二百年，直到1860年代中期，高郎桥地区还只是上海县东北乡引翔镇西侧的一个准乡镇。

随着1860年代中期英、美租界落户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西侧滩地，并迅速向东北扩张，高郎桥地区在1870年代后渐成为公共租界东区与引翔乡南北分治的接壤地，社会变迁进程呈现双轨并行的轨迹，马路、厂房与农田、村舍对视。1910～1940年代，高郎桥地区已成为租界与华界接壤，市郊毗邻的一个华资纱厂区（三家棉纺织厂，六千余工人）。延续近百年的纱厂区，使高郎桥地区在1950年代后期发展成为上海的一家棉纺印全能厂，聚集上万棉纺织工人的工作地、生活区。城市公共交通网、纱厂区建筑群使它成为沪东纱厂区的一部分，大量苏北移民的入居、进厂也改变了原来本地人为主的单一户籍结构、生活方式、民情习俗。期间，高郎桥纱厂区经历了私营厂、公私合营厂、国营厂（三十一棉纺厂）的产权变更，1949～1992年累计利税约13.1亿元，约是它1958年固定资产的48倍。1990年代后上海棉纺织工业进入调整期，它被迫以厂区房地产抵

高郎桥纪事
近代上海一个棉纺织工业区的兴起与终结(1700~2000)

债,停业关闭,如今仍有近千三十一棉纺厂退休职工聚居在厂区周边的简屋区。近百年来,高郎桥地区从一个准乡镇转变为一个棉纺织工厂区,又演变为一个都市商品房住宅区与简屋区混杂共处地区。站在 21 世纪之初的高郎桥地区正步入地区社会变迁第二次突变期,谁将引领它进入后工业社会?

作为近代上海棉纺织工厂区的一个缩影,高郎桥纱厂区继承了混合的遗产:荣耀与苦涩,留下诸多值得梳理、研讨的社会、历史话题。

工业社会是一个与之前人类社会迥然不同的崭新社会,是一个世界性社会,拥有一个特殊的社会机构、组织系统,即工业化企业。它凭借先进的工业设备、经营管理制度,曾释放出创造社会财富、推进文明进程的巨大创造力。上海自 1840 年代中期被迫成为首批对外通商的五个条约口岸城市之一,租界港区即被纳入远东国际贸易网,成为近代上海城市崛起的起点。19 世纪后期,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也率先在条约口岸城市租界启动,上海有幸成为中国工业社会的先行区之一,棉纺织工业的摇篮、第一重镇。由此上海聚集了以棉纺织工人为主的近代产业大军,庞大的低收入城市居民群体。近代上海的社会变迁呈现三个社会的共存:远东国际时尚都会、近代工业社会、传统农业社会,期间不同利益集团的得失、贫富差距日趋悬殊。

二战结束后,在工业社会向工业化后经济过渡的大背景下,海外一些知名的老工业城市的经济结构趋向多样化,从工业经济转变为工业化后经济的性质,服务业成为主要经济部门,“脑力”服务逐步取代体力服务(金融、行政管理等)。由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对熟练体力劳动需求减少,一些低附加值制造产业职工遭遇淘汰性失业。20 世纪后期,一些大型工业城市面临清理工业社会遗产的种种难题。昔日活力四射的工业区成为废弃厂区、简屋区相伴的落伍角落。同时,由于当地就业机会减少,大面积的贫民区有待拆除、更新,也成为城市发展一个持续存在的社会问题。同期的中国,加快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五年计划战略蓝图成为凝聚民族认同感的旗帜,工业企业的经营被纳入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计划管理系统中。数代棉纺织职工群体的命运曾与棉纺织厂的单一产业结下难解的生死因缘。1990 年代上海纺织工业进入悲壮的调整转型期,压锭、关厂,数十万纺织职工从昔日工业战线的主力军变为被迫离厂下岗,迎接再就业挑战的排头兵。

近百年的棉纺织工业在上海留下什么?昭示什么?只有历史能告诉未来。

中外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工业社会的研究,在企业史、工人生活史、工业社区史方面留下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着人类工业社会宝库的收藏。^①在近代上海棉纺织工人生活史领域也有不少先驱论著。^②本书的研究,是在借鉴、吸收他们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本书的研究方法是以近代高郎桥地区为个案,展示近代上海工业社会进程中,纱厂、女工群体、纱厂社区三个方面的互为依存的紧密关系,形成以棉纺工业为轴心,紧密结为一体的社会经济单位。本书的尝试主要在三方面:①将一个近代纱厂区、一个棉纺织女工群体、一个纱厂工人聚居区三者的百年变迁、相互依存制约关系进行分阶段的考察、梳理。通过长时段的考察,试图梳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某些轨迹、棉纺织工业社区社会演变的走向。②在史料收集运用上,注重档案、口述、图像资料的组合运用。试图将企业史、工业社区史的百年叙事与亲历者的个人口述回忆融合在一起,在一个按年代编排的框架里,将高郎桥地区的棉纺织厂区、居民社区和棉纺织职工生活的历史编织在一起。为此,本书采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以档案文献、口述访问、亲历者回忆相结合,选配相关的照片,再现近代高郎桥纱厂区棉纺织职工的家庭生活,高郎桥工业社区居民不同地域文化融合的状况以及他们的现实处境。力求更真实地折射工业社会演变进程中,一个棉纺织厂区的历史变迁场景。③本书选录部分高郎桥纱厂区的老职工、老居民的口述、回忆作为附录,用

- ① 19世纪中期关于棉纺织工人生活状况的著名论著有: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版:1845莱比锡、1892年;英文版:1887纽约,1892伦敦)。(法)保尔·芒图著、杨人梗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Paul Mantoux: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Essai Sur les commencements de La grande industrie moderne en Angleterre éditions Génin Paris 1959.)。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英]E. P. 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Thompson, Edward Palmer.: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等。
- ② 朱友渔:《曹家渡调查记》,刊于《约翰声》第28卷第452号(英文,1917年),由刘麟生译成中文,刊于《约翰年刊》(1921年)。朱懋澄:《上海工人住房及社会情形记略》,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职工部,1926年印行,第1版。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北平社会调查所1930年版。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市社会局1934年版。韩起澜(Emily Hoing):《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纺织厂女工(1919~1949)》(*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等。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一卷第一册,中国工人阶级的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卷第二册,中国工人阶级的早期斗争和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沈以行等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等。

亲历者们的朴素语言,展示他们亲历社会变迁的感受和应对,赋予历史读物以鲜活性与真实感,为近代上海工业社区史研究留下一份个案。使民族工业化的进程能呈现它无穷的创造力和理性、人性的魅力。作为一代亲历者,共同完成对这一段历史进程的追忆、记述,也是在履行一项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浦西东北角的准乡镇	1
浦改道、滩成田	1
引翔港市：高昌乡的唯一市镇	3
聚落：蒋家大院、茭白园	5
地标：庙与桥	7
第二章 杨树浦：沪东工厂区的兴起	10
“熙华德线”：租界的楔入	10
引进纺织工厂的先锋：怡和丝厂	13
棉纺织厂落户杨树浦	17
沪东的两重天：位于租界与华界接壤地	28
第三章 改地换天：创业高郎桥	34
沪东：上海棉纺织厂的半月天	34
开创者与后来人	46
风雨铁三角	61
孤岛岁月	81
战后雄风	86
企业文化的起步	89
离去还是留下？	98
城乡毗邻的纱厂区	100
第四章 移民潮中的高郎桥人	107
“杨树浦奇迹”的背后	107

工运潮起与工人夜校·····	110
女工的机遇与限制·····	117
苏北移民聚落·····	146
纱厂区与低消费·····	162
第五章 新社会:静悄悄的变革 ·····	180
国企纱厂的多重任务·····	180
企业家与新朋友·····	189
劳资合作的尝试:私营-公私合营·····	197
福利竞赛·····	208
标准化操作法与三班制·····	218
公方、私方 ·····	226
运动风浪:整风、审干、肃反 ·····	240
第六章 “老杨浦”的多重角色 ·····	247
转身:从棉纺织经营到城市管理 ·····	247
党委与计划管理·····	251
一手抓钢、一手抓纱 ·····	258
生活、生产并重 ·····	264
厂办学校·····	267
第七章 女工挑大梁 ·····	270
评先进:偏重女劳模 ·····	271
操作竞赛与“种子队”·····	275
先进操作法与姐妹合同·····	282
娘子军·····	290
劳模风采·····	297
第八章 低工资与互助网 ·····	304
“三低一多”·····	306
互助金与救助基金·····	312
住房四难·····	317
纺织世家与顶替工·····	325

第九章 工厂街区的新生活	333
纱厂区:荣耀与困境	333
国营百货公司与低成本商业网	339
劳保与社区医疗	343
东宫、少年宫与小戏院	346
宁国街道:低消费区的长期延续	358
文化多元:高郎桥人的延续	380
第十章 三十一棉:国营厂的浮沉	388
在风狂霜峭的急流中	388
两手抓	393
国企青工:过七关	398
轮班工长与“二传手”	423
第十一章 创利大户的市场学步	429
改革起步	430
多重社会角色的延续	436
光环下的隐忧	439
市场风雨	445
第十二章 国营纱厂的遗产	452
产业调整的阵痛	452
再就业开篇	461
主人翁的体验与诉求	476
第十三章 沪东“下只角”的延续与蜕变	490
简屋区与群楼区为邻	491
居民主体:低收入群体	502
淮剧沙龙:自娱自乐(1990~)	512
沪东纱业区的一个遗址	519
结束语:辉煌的业绩、沉重的遗产	525

附录一 访谈与回忆资料选录	530
一、高郎桥纱厂区	530
童工眼里的厚生纱厂(秀珍)	530
五代纺织世家的回忆之一(莲莲口述、士秀记录整理)	534
五代纺织世家的回忆之二(王琪)	540
在高郎桥纱厂区的四十年(武宝璋)	545
略谈上海的印染厂(蒋昌宁)	561
二、国企职工	564
车间与班组之一(宝尔)	564
车间与班组之二(吴财根)	565
从技校学生到车间副主任(雪珍)	566
从校门到厂门(闵茗)	570
纺织世家的儿女们之一(傅莹)	578
纺织世家的儿女们之二(袁文)	585
纺织世家的儿女们之三(伊梅)	593
三、两代高郎桥人	597
落户引翔港之一(成女)	597
落户引翔港之二(阿宝)	600
蒋家浜生活(阿珍)	604
父亲与我(迺银)	609
童年往事(阿根)	611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618
后记	623

第一章 浦东北角的准乡镇

如果说内陆城市的历史往往源于古树根下，那么解开上海历史奥秘的钥匙或许就隐藏在海岸线的绵延东迁中。公元前 221 年，当秦帝国完成统一大业时，上海地区的海岸线才抵达今嘉定、南翔、莘庄、奉贤一线，今上海地区的整个东半部依然沉睡在海平面下。今上海地区行政建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唐天宝十年（751 年）上海地区西部初置华亭县。北宋熙宁十年（1077 年）华亭县设有上海务。南宋建炎元年（1127 年）宋室南渡，上海地区人口增加，物产以稻、棉、渔、盐为主，港口商业渐起，遂称上海镇，为华亭县东北一巨镇。1292 年（元至和二十九年）朝廷批准设置上海县，辖区为原华亭县东部五乡（长人、高昌、北亭、新汇、海隅）。于是，原本管辖户口 64 000 户的上​​海镇就升级为元帝国版图上的一个县署所在地，^①与华亭县（同属松江府）共同管辖这片东海之滨、长江出海口南端的滩地。^②

浦改道、滩成田

宋元以后，今上海地区的经济开发孕育着重大转机与突破。北宋的松江（元代后称吴淞江）下游大体是两浙路的苏州与秀州的界河，到了南宋，苏州与秀州分别改称平江府、嘉兴府，松江下游依然是它们之间的界河。元代位于吴淞江南岸的青龙港是该地区西通苏州，东流入海的唯一海港，当时的出海河道在今浦东的东沟、顾路一带，上海县城就成为长江三角洲的航运门户之一。

① 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16、20、22 页。

② 明清时期，今上海地区的行政区划经多次重组，析置青浦县（1542 年，明嘉靖二十一年）、南汇县（1726 年，清雍正四年）、川沙县（1810 年，清嘉庆十五年），上海县辖区由原本的 5 个乡（25 保），被缩减为 2 个乡（12 保）：长人（析置南汇县）、高昌（分隶川沙县）。

高郎桥纪事
近代上海一个棉纺织工业区的兴起与终结(1700~2000)

由于今上海地区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东南端,绵延 6 000 年以上泥沙沉积,土层一般已在 180~300 米,地表土壤由水稻土、旱地潮土(coastal upland soil)组成,加之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①形成一片适于种植水稻、棉花等农作物的天赐沃土。两宋以来,先民们凭借这片地势低平、河道纵横的广袤滨海滩地,以稻、棉、盐、航运为生计,渐至温饱无虞。

明初黄浦江下游改道为上海港的兴起创造了历史的机遇。有关黄浦江的文字记载始见于南宋,它是吴淞江的支流之一,初名黄浦。明初因吴淞江下游淤塞成陆,上海县府疏通范家浜,南接黄浦北通吴淞江,遂由黄浦江下游充当出海主航道,汇集吴淞江水北上在今吴淞口入海。后经多次疏浚,黄浦江汇集太湖 80% 的排水量注入东海(全长 113.4 公里),足以抵御海潮,江面宽约 1 公里,水深可行大船,它西接上海县城、松江府城,可进入大运河流域,东出吴淞口入长江口出海。16 世纪初期的黄浦江已是上海地区的第一大河,长江入海口的第一支流。从此上海县拥有直接入海的航道,因港市兴盛,在明中叶(16 世纪中期)号称“小苏州”,跃为江南市镇的后起翘楚。

清乾嘉年间(1736~1820 年),由于吴淞江北岸的浏河口外渐形成横亘十余里的拦门沙,曾是北洋埠际贸易港的浏河港,已不宜海船进出。于是承担北洋埠际贸易港兼海路漕运码头的重任就落在上海港,它是府城松江的外港,也是清廷南北沿海贸易的中转港。清道光年间的上海港因洋货贸易兴隆,又添“小广州”的美名。

在上海县初建的二百年,上海县东北角的高昌乡还是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 年)的太平寺(今兰州路 373 号)是上海县境浦西东北角远古变迁的证物,也是今杨浦区境最早建造的佛寺。这座佛寺的选址方位,大体与高郎桥形成南北向垂直线上邻近的两个点,这暗示北宋初年这一带地区已有先民垦殖、定居。初建成的太平寺占地广阔,分设三进大殿,多植银杏树,全盛时有僧众百余人,寺旁有马厰、僧田、僧人墓地等。明初黄浦江下游改道(携吴淞江经范家浜北流入海)后,高昌乡的地貌特征也有所改观。在黄浦江与吴淞江会合出海的整个下游河段,两岸逐渐形成大片沿江漫滩。明末清初,当摇船而来的邻县乡民从长江口循黄浦江进入上海县境的东北角时,这片浦江两岸漫滩旷野自然是他们落脚安家的首选地,并悄悄成为移民垦殖的家园。1863 年上海县境东北角浦西地区已有 2 个市镇,自南而北分别是引翔港、沈家行。^②

① 王孝俭主编:《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2、180 页。

② 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 页。

在晚清上海县北境的水道图中,自西向东排列着6条水道,它们的名字尚处形成期:虹口、下海浦、杨木浦(今杨树浦港)、引翔港、西虬江、蕴草浜。引翔港市在县东北20里,距离吴淞口16里,旧志称它“近海口,警防要地”;^①沈家行市在引翔港西9里,东接宝山县。

高郎桥的故事就发生在县境东北角,引翔港、沈家行这两个小村镇之间的水乡僻壤。

引翔港市:高昌乡的唯一市镇

明清松江府城是辖境的漕运枢纽,有水路西通大运河,当地手工织成的土布也多经松江府城外销。当时上海县的土布在土布市场也统称“松江布”,闻名东南,民谚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嘉善县)”一说。^②松江府以“财赋甲于东南”,“自成一都会”。^③清代上海县是以织助耕,乡民用优质棉布既叩开了致富之门,也形成一连串的棉布市镇。当时县境的稻棉经营重心在浦西淞南耕作地区,那里地势略高,邻近府城松江,是乡民择址定居的宝地。棉布集镇先后主要有龙华、北桥(宋)、乌泥泾(河道在今上海植物园附近,元),七宝、莘庄、闵行、三林塘(明)等。乡民们采用的大弓弹棉、手工三锭纺车、脚踏手工织机,都是由黄道婆(乌泥泾人)改良并传播、推广的手工纺织机具。三锭纺车(一手挽三纱,以足运转)用脚踏转动纺轮,可以腾出一只手,既使纺纱效率提高2~3倍,又操作省力。脚踏织机,可以两手并用投梭,乌泥泾民谣“黄道婆,黄道婆,教我纱,教我布,三只筒子两匹布”反映了乡民们对黄道婆的尊敬。七宝镇东街以制作三锭纺车闻名,有纺车街之誉。^④棉布市镇也往往是乡民聚居的首选。如闵行是黄浦江上游一个重要渡口,出入便利,又少水旱之灾,民间有“三世修来住闵行”之说。俞塘在元代有富户俞氏居住,沪谚“有钱难买俞塘北”,晚清竹枝词还有“劝郎莫再经商去,多买俞塘南北田”,反映上海人对落户俞塘的向往不减。土布经营也使田土饶薄的松江府成为江南重赋区之一。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松江府辖2县,垦地占全国0.6%,田赋占全国税粮4%;正统八年(1443年)后因松江

① 秦荣光:《同治上海县志》,1902年铅印本,卷一,第9~10页。

② 清中叶上海县所产稀布(尖布)远近闻名,“东稀”产于东北乡,“西稀”产于西南乡镇(龙华、七宝,又名清水布),“龙稀”产于龙华、七宝,销关外。王孝俭主编:《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8页。

③ 《松江府志》(54卷)清康熙二年(1663年)刻本,卷五风俗,第4、2页。

④ 王孝俭主编:《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6、632页。

高郎桥纪事 近代上海一个棉纺织工业区的兴起与终结(1700~2000)

税粮拖欠太多,奏定以布代粮,弘治十五年(1502年)松江府垦地占全国0.76%,纳粮占全国3.85%,多于全闽之输将。清代(1846年)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8,齐民四术卷1,农2)也有“松太钱漕不误,全仗棉布”之说。^①当时地处上海县境东北角边缘地带的引翔乡(范围包括今虹口区、杨浦区的部分),农作物以粮、棉为主,土布也是特产之一,俗称“东稀”。

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上海县浦西东北角出现第一处市镇:引翔港市。它位于引翔港与周塘浜交汇处,于明万历年间形成村落,之后,里人周锡璜慷慨解囊,修筑便民石道,西通虹口,村落扩大,遂成集镇。因临近引翔港得名。^②清代为上海县14个市之一,也是上海开埠前浦西东北角唯一的市镇。

晚清的引翔港市有东西南北四条街,西街之北有后巷,镇上街道总长约1公里。西街最长(约400米),南街最短(约200米)。四街的市梢位置分别在今双阳路口、宁武路东、河间路北、双阳支路南。街口砌有栅墙,安装栅门,晨启夜闭。^③晚清镇上有居民约500家,以周、沈、万、赵、王,五姓为主。后有安徽移民迁入。自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王占三在高昌乡行医、种痘,妇孺皆知,为引翔王氏中医世家的第一代,历经百余年不衰,王氏第三代王森澍(1814~1888年)因医术求精,撰有《医方切韵》,并为贫病者施医而享名乡里。第四代王光熙(1838~1906年)载入方志“尤精儿科术,医者坐常满”。(《上海续县志》)

镇上主要的建筑是寺观、善堂。东栅的观音堂(白衣庵)建于明万历年,每逢初一、十五香火盛。西栅口有观音阁(光绪年)、公道所。厚仁堂由里人周锡琮、王森澍等定义筹建,周镐倡捐堂房,周冕倡捐棺木,并出田5亩为义冢。兴建工程于1847年落成,占地11亩。这座善堂的厅堂悬挂着由知县兰蔚雯题款的“惠普桑梓”的匾额,堂产包括在杨树浦的400亩堂田。它以年收租金用于兴办多项地方福利公益事业,每逢年关腊月施粥送衣,从无间断。在镇上周、王、沈、杨等大姓的赞助下,厚仁堂后来又添设义塾、消防水龙、水桶,办理抚恤寡妇、代葬施棺、寄放棺柩等公益设施。^④清末里人周志容又以“19图少州田70余亩归堂,取租充费”。^⑤咸丰年间(1851~1861年),厚仁堂里创办的义塾是引翔乡第一所小学堂,1868年知县将它收为官

① 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1289~1937),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28~29、33页。

② 上海地名志办公室编:《上海名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93页。上海通网站:引翔古镇。

③ 施玮等:《宁国街道志》,1993年打印本,第174页。

④ 同上,第174、176页。

⑤ 清末,周志容又增恤嫠义塾。秦荣光撰《同治上海县志》,1902年铅印本,卷三,第28页。

学,后为引翔小学堂。厚仁堂的先董祠,既是纪念这些造福乡里的先辈们的殿堂,也曾是王氏世医坐堂义诊之地。

王焕崧,字纪台,是引翔港镇王氏名医第三代王森澍之子。父业医、工诗,母亦酷嗜诗,他自幼秉承先祖庭训,习举业,求仕进,后为附贡生。因他通晓经史,善诗文,在乡间设馆授课,兼办地方公益义举。后因家累繁重他散馆经商,仍不废吟咏。1899年丧一子后,“惟望后辈发达而自己不复作仕进想矣”,^①享年74岁。

王焕崧对家乡的最大贡献是他曾编成《引翔乡志》一卷,^②这也是引翔乡有史以来记录乡土史迹的唯一历史读本。遗憾的是,在随后的连番兵祸天灾中,这本珍贵的《引翔乡志》与厚仁堂都未能幸免于难,早已无处寻觅,只留下引翔港的地名沿用了百余年。

聚落:蒋家大院、茭白园

在杨树浦港与周塘浜(今兰州路以东长阳路的南侧)交汇的航运孔道周围,塘浜交错,滩地散见。直到19世纪末,西侧仍有周家浜、东余浦、中余浦、西余浦4条河流纵贯,横浜、蒋家浜横贯东西;东侧仍有13条河流。当地居民的定居史始于清初的康熙年间。最初落户的居民主要是来自邻近的浦东、崇明、苏南的农民,姓氏聚落多散处杨树浦港两侧,沿浜而设。方言略近浦东口音。乡民聚落由西向东扩展,多依姓氏或附近水道命名。

杨树浦港西侧(即江浦街道北部)的早期村落有蒋家浜,据说清雍正时有蒋姓定居,因蒋氏后人在朝做官,在村上建蒋家大院,有厅屋、厢房数十间,广植树木,是当地的大户人家。蒋家大院门前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浜,也因蒋家疏浚而称蒋家浜。附近还有一座横跨杨树浦港的木桥,桥东堍是西方子桥。茭白园位于蒋家浜北,是中余浦流经地,浜沟交错,清中叶形成村落,居民多姓张,聚居点集中两处:一在中余浦旁,一在蒋家浜北岸,因两侧的水塘、滩地以种茭白为主,故名茭白园。^③1800年附近又有钱家宅

① 王焕崧:《冬荣室诗钞》,中华书局1906年,铅印本。

② 宋初,今虬江以南,隶华亭县。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批准设上海县,下辖五乡,区境为上海县高昌乡。今虬江以北,先后隶属昆山和嘉定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从嘉定县析置宝山县,区境北部属宝山县殷行乡和江湾乡一部分。民国元年(1912年)虬江以北属宝山县殷行乡。虬江以南,租界线以北属上海县引翔乡。民国十六年上海特别市成立,引翔、江湾、殷行3乡划归上海特别市。次年7月,改为引翔、江湾、殷行3个区。百度百科:杨浦区。

③ 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94、143页。



晚清高郎桥地区历史河浜(引自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

的村落形成。

杨树浦港东侧(即宁国街道北部),在乾隆时期俗称蒋家浜河东。以王家宅为范围最大的姓氏聚落。康熙年间有东王家宅,随后陆续扩展,形成四处村落:中王家宅、后西王家宅、西王家宅,连成片状。中王家宅的村东是王家祠堂。严家木桥聚落的得名,与1700年严氏来此定居有关,该村的地块后来归到四位业主名下,他们是莫、陆、倪、池四姓。卢家宅的形成源于1700年有卢姓木工入住,最初仅5~6户人家;东海村在乾隆年间仅2~3户。后来形成小村落,还建有一个小社庙,俗称小庄庙(今东海村54号址),一条东西向小河浜就称庙浜。此外,附近的早期村落还有赵家宅,在清中叶成为小集镇,据说清中期有位赵姓盐商来此定居,人称卖盐赵家宅(今幸福村52~58号)。附近有条东西向的河浜,因为先民多以养猪、种地为生,习称猪猡浜,后改称朱龙浜。后西王家宅地块位于黄兴路西,王家宅北,在1900年时它还是一片农田。据说浦东王姓来此定居时,该地块四周已有中王家宅、西王家宅两个村落,故取名为后西王家宅。^①

6 散落在沿浜地块的聚落往往由简陋的跨浜小木桥连接,陆续出现的跨

^① 钱铮主编:《杨浦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121、132页。